

麻将声声

——社会问题报告文学集

“黄灾”

启示录

流失生

平地而起的狂潮

为大地母亲代写的万言书

性病：疯狂的恶魔

人啊

请手下留情

福著
贤编

日报出版社

写在前面

尽管我已献给读者几本习作，但从未在书前写过一个字，实在非说不过，也就在书后“跋”或“记”一下，但这一次，我决定打破惯例，也来个附庸风雅，在前面说上几句。

三句话不离本行，在这里当然是谈谈这部书。它能在今天与尊敬的读者见面，实在是历经坎坷。我曾将这厚厚的一迭书稿送给两个出版社，皆因种种原因而碰壁，后来找到以前曾向我夸过海口的朋友，并将书稿给他，转眼一年多过去了，虽然，我厚着脸皮一再催问，但仍然是答应得蛮好，而毫无结果。转眼就过去了一年多，仍然是泥牛入海，且稿件仍搁在一家出版社。我借出差之机，去出版社取稿，未果。每每碰见那朋友，他仍然是拍胸膛：“没问题，赔钱我也给你出。”

但就是出不来。不但出不来，而今连一点“出”的影儿也没有。

也许这是一个拖延战术。我既不敢伤了朋友的面子，索回那也许是找不到了的书稿，也不愿理直气壮地对他说：“你出不了就算了。”中国儒家思想或曰中庸之道在我脑中根深蒂固了。

我只有自认晦气，只有打落门牙往肚内吞，为了这部出不了世的书稿，我说了不知多少好话，花了不少邮费，到头来就这样拖着。拖到何年何月是个头？我也不知道。

稍安心的是我还有份工作，并不靠挣稿费来养家活口。

拖就拖吧，只算这书稿命不好。

有一天，我碰见了老朋友、《厂长经理报》总编辑龙良贤先生，他问起我的近况，特别是写作情况。聊了一阵后，我言不由衷地将这已抛在了脑后的难言之隐告诉了他。岂知，他拍案而起：“你的文章我读过，很不错嘛。我设法给你找出版社，一定要让它变成铅字。你不要再这样白白的等了。”

我想起了十多年前曾轰动国人的那部国外有名的独幕剧《等待多戈》，到头来什么也等不到。

“怎么样？你把稿件给我。”

“可是，我没有了。”

“有底稿吗？”

“有。”

“赶快整理出来，给我。”

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好不高兴。当天晚上，我找来两根凳子迭起，从屋顶上的吊柜里找出已打成捆，名副其实的束之高阁的底稿，动员妻子、亲友，加上我自己皆抽出下班后看书报、看电视、辅导孩子作业以及睡眠时间，一个一个格子地爬起来。

若干个日日夜夜过去了，这38万字左右的稿件才重新抄出来了。我将它们交给了龙先生。

在这里，我要再一次感谢龙良贤先生以及出版社的有关同志。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这部书就永远永远不会到达读者手中。

至于这部书里的各个篇章的成败得失，我就不在此饶舌了。

读者是最好的裁判。

序

要变革社会就要正视社会问题

约莫 80 年前，俄国才华横溢的现实主义作家库普林在揭露当时的卖淫现象和妓院制度的小说《火坑》（又译《亚玛街》）写成之后，在卷首写下了这样几行字：“我知道，不少人会认为这部小说不合道德、有伤风化，然而，我仍怀着赤诚之心，将它奉献给母亲们和青年一代。”这是作家的题辞，也是他的声明。库普林的这个声明并未能阻止小说出版后一些人对它的责难，正如这些责难者并未能阻止库普林的作品轰动俄国和受广大读者包括“母亲们和青年一代”的理解和欢迎，并未能阻止它成为世界文学名著并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一样。

李显福同志的这部报告文学集，是否也会有人认为它（或其中几篇）“不合道德、有伤风化”。我不得而知（因为二者的内容、形式、写法和写作时代都有所不同）；我只知道，在中国，从《离骚》到《官场现形记》，从《水浒》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从《红楼梦》到《阿 Q 正传》，从小说、戏剧到报告文学到一篇杂文、一首小诗。有哪一个揭露社会问题、触及社会矛盾或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成功作品不受责难，不受非议，甚至尚未出世就有人欲扼杀其于襁褓之中而后快的呢？！不过，我所以想到和引用库普林的题辞，着眼

还在后半句，即不管有人责难也好，无人责难也好，有多少责难和多么严重的责难也好，对于一个“怀着赤诚之心”面对人类面向未来的作家而言，决不相信因为有责难，有压力，好的就会变成坏的，白的就会变成黑的，是的就会变成非的，有益的就会变成有害的，因此他总是照样坚持不懈地潜心写作，信心百倍地迎接挑战，理直气壮地把作品奉献给读者。正因为如此吧，显福一篇接一篇地写出他的报告文学，而我，作为这部报告文学集的先睹为快的读者，也怀着赤诚之心，向广大人们推荐这部作品。我以为，无论为官为民的，为父为母的，为师为长的，为兄为姊的……都值得读读这部作品并思索思索其中揭示的社会问题。

这部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切入现实，都直接取自生活之流的深层，晃荡着底层社会的光怪陆离和宿疾沉痾，带有强烈的、甚至发聋振聩的现实迫切性，把一个个或鲜为人知，或出人意料，或老生常谈却百思不解，或司空见惯却波谲云诡的社会问题按其本来面目展现在我们眼前，好像展现一幅幅五光十色变幻莫测的社会病理解剖图和畸形世态写生画一样，作品描述和剖析的保姆市场问题（《保姆市场，一个解不开的怪圈》），恶浪狂风般冲击教育大堤的流失生问题（《流失生，平地而起的黑色狂潮》），使个体户叫苦不迭的闻所未闻的非法摊派和敲诈勒索问题（《个体世界的困惑》），骇人听闻的少女失足和性犯罪问题（《危险的年龄——写给少女的备忘录》），像瘟疫一样蔓延肆虐的性病问题（《性病，疯狂扩张的恶魔》），席卷中华大地的赌风问题（《方城之战》），引起国土大幅度减少，将影响到吃饭的滥占耕地问题（《人啊，请手下留情——为大地母亲代写的万言书》），防不胜防，

屡禁不止的黄色书刊问题（《黄灾启示录》），愈演愈烈的拐卖人口问题（《川妹子，你为何走上那条路？》），风起云涌的办报办刊问题（《重庆办报办刊热透视》），毁誉参半的出租车问题（《的士：万花筒》），以及 80 年代出现的婚姻问题（《啊，一年又一年——未婚同居者咏叹调》），人才问题（《追求者》、《寻找川江号上的法国姑娘》），党纪党风问题（《哨兵》），复转军人安置问题（《欢迎你，归来的亲人》），女子推销员问题（《女子推销，一个神秘的世界》）等等。这些问题虽不是每个人都必然碰上，但却是每个家庭都可能碰上，虽不是所有这些问题都同你有关，但却至少其中有几个问题直接间接地同你相关，因此，就总体言，这部作品提出的问题无疑涉及千家万户，关系男女老少，牵扯各行各业，连接每个家庭、每个群体、每个社会机器及其细胞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从宏观上言，这些问题就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大地上，出现在我们的身旁眼底，影响着我们当代社会的健康发展，威胁着千百万人的安宁和幸福，因此，每一个关心社会进步、关心人民命运和国家振兴的人，都不能在这些问题面前闭上眼睛，视若等闲，正如一个人身上的痼疽不及时治疗会溃烂、扩散而危及整个生命一样，社会肌体上那么些痼疽如不加治疗，任其发展，不仅会造成（事实上已经造成）某些人家破人亡，而且会导致整个社会肌体的蜕变和衰朽。这不是杞人忧天。以流失生问题为例，几年后中国可能无大学；那么，同样不难设想，在这个问题日益严重而任其发展的情况下，在没有了大学的情况下，再过若干年，中学、小学又能有多少呢？又以性病为例，1964 年我国已向全世界宣布“基本消灭性病”，而 1988 年 12 月 1 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宣

布，1982年至1987年间，我国性病“正以每年递增3.12%的速度发展”。在某些僻远地区，性病发生率已高达50%，即二人中就有一人染上性病！……

这部作品展示的种种社会问题的值得普遍关注，不仅在于这些问题性质的严重，而且还由于在这些问题的解决、防止、根治上，几乎都处于无人“管”的状况。这当然不是指完全无人过问。某人犯了罪被告发了，抓起了；某人违了法，包不住了，被惩罚；某个家庭大祸突然临头了，有人登门或同情或劝慰；某人发病支撑不住，被送进医院……如此这般的“过问”和“关心”是常有所见的，但这些社会问题仍然在发生，在发展，甚至日甚一日地猖獗泛滥。如何根本解决，根本防止，那就天知道了。所谓无人管，正是指这种状况。这些问题表面上的确不如大地震、水旱灾殃、火车撞车、森林大火、瘟疫流行那么紧急迫切，引人注目，因而它们易被忽视，更由于许多社会问题往往非某一机构某些人员单枪匹马所能解决而牵涉到公安部门、教育部门、卫生部门、旅游部门，党、政、工、团、妇、家庭等各个方面，因此往往形成了解决这类问题上的怪圈：越是问题严重、牵涉面大，越是互相推诿，无人负责，无人去管；而越是无人去管，问题也就越发严重，涉及面也就越来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这些问题的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和来龙去脉如实加以反映和剖示的报告文学，真是功德无量了。人们称记者为“无冕之王”，我想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家也可称为“不管部长”吧！也许我们也真该设立一个“不管部”来管理各部门所不管或无法统管的社会问题，来协调各部门各方面统一地根治这些问题，才能使“综合治理”不致成为一个借口和搪塞之辞吧！

然而遗憾的是，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但未能得到治理，而且往往连报告文学这样一种揭示问题以引起疗救的方式也要受到误解和非难。人们并不因一个人被诊断有病而遭怒于医生，并不因一幢楼房被揭示属于危房而讨伐检修者，那么，为什么一个揭露实际存在的社会痼疾的作家，一个拿起手术刀解剖社会病毒的报告文学家，经常会受到不公平对待，甚至视若洪水猛兽般可怕呢？这究竟是怎样一种文化心态使然呢？早在18世纪，伏尔泰在其最出色的哲理小说《老实人即乐观主义者》中，就已展示那种用掩盖社会矛盾来“增强”人们信心的企图最终将在越来越不可收拾的现实面前碰得粉碎，连同那盲目乐观主义的自欺欺人哲学的宣扬者本身也只能被现实矛盾所吞噬。其实，没有揭露社会问题的作家和报告文学，社会问题照样存在并发展，有了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揭示，让这些问题被广大人民所重视，才可能为解决治理这些问题创造条件。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从来是靠不断地揭露和解决矛盾而实现的。显福同许多我见过的报告文学作家一样，把自己写作报告文学称为“戴着枷锁跳舞”，那么，什么时候才能使舞蹈者在身体或心灵上不再负着枷锁呢？

显福这部作品值得一读，还由于他对所涉及的社会问题的描述和剖析颇生动而独到。这些社会问题也许在别的报告文学家笔下已有所触及，但由于显福所切取的生活断面、所占据的具体材料和内容、写法的不同，特别是解剖的广度、角度和深度的不同，因此常能人所未见，给人出奇制胜、耳目一新之感。如保姆市场问题，他不但全面展现保姆和雇主两方面的问题，而且提出和剖析了一个（实际上是两个）“解不开的怪圈”：一个是大量保姆拥入市场却找不到雇主和无数

雇主进入市场却找不到保姆的怪圈，另一个是保姆自由市场危险重重却兴旺异常和公办的“家务服务介绍所”安全可靠却门庭冷落的怪圈。如流失生问题和少女失足问题，他不是简单地笼统地归于“金钱上帝”的冲击和“外来影响”，而是从社会的、家庭的、学校的、历史的、现实的、个人的及偶然的原因上进行了多层面多视角的具体而细密的解剖。如个体户的困惑，他把它放在历史的纵轴和种种社会势力的横轴相交叉的座标上来考察，因而别有深度和新的意蕴……生活之树常青，直接来自现实生活的东西总是个性独具而不会与人混同和雷同的。当然，渗透在这些描述和剖析中的，是作者的真诚、责任感和不竭的追求。作者不仅在记事，也在抒情，更在沉思。字里行间我随处可以感受到他时而痛心疾首，时而愁容满面，时而怒不可遏，时而仰天长叹，时而在同不幸的普通人一起流泪饮泣——我随时都能同他那关注社会变革、关注人民疾苦的心灵共鸣。我认为这种对生活对人民的真诚、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一个作者，也是一篇报告文学的灵魂所系。这是任何“玩”文学、拿文学蝇营狗苟，甚至为求一己之利不惜拍卖灵魂、出卖他人的人所永远无法比拟、无法企及的。

我同显福相识并不久，但我们神交却已非一日了。在认识他之前，我早就读过他的被国内乃至香港、美国共十几种书刊转载的报告文学了；而他呢，在一封来信中说，在中学时读了我在《文艺报》上同文学界的某权威笔战的文章（那是讨论《达吉和她的父亲》的），就对我有印象了。“文革”中他下乡当知青，后相继当过教师、工人、调度员、宣传干事。1978年考入西南师大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作记者，1989年

调到新闻出版机构工作。贯穿这曲折多变的生活和工作历程的，是他不变的对文学的执着追求和在艰辛的条件下排除干扰坚持写作的意志。在因写作而受到种种冷嘲热讽，误解曲解，冷落打击以至被横加罪名的不公平遭遇中，他也遇到过对他理解、支持、爱护因而使他难忘的好领导——某单位子弟中学的校领导。男儿有泪不轻弹，显福竟因遇上这样的好领导而欣喜得流泪了。对于一个赤诚的写作者而言，有什么比被误解曲解和粗暴对待更痛心，有什么比被真诚理解更需要的呢！

有所得必有所失，有所失必有所得。显福的创作成果，是用牺牲无数玩耍、娱乐、休息、同爱人散步、同女儿逗趣作代价换来的。“为了我仅有的业余时间不被占有，女儿两岁半就哭着进了全托，托儿所失火，她的邻床小朋友不幸夭折，她也差点殃及，妻子又哭又闹……”——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但是，他把耕耘的收获当作“对妻子、对女儿的回报”，谁说 he 所得不是大大地多于、高于、重于所失呢？

在我为显福这本报告文学集写序过程中，他的另一本报告文学集《未婚同居纪实》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另一本报告文学集《成功者之路》也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长篇哲理报告文学《独木桥上的眼泪》和报告文学集《留在山巅上的梦》也分别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他是一个比较高产的报告文学作家。我相信，他沿着自己的创作路子，不断地开拓，探索超越，定将写得更好、更深、更出色。也在这个写序过程中，我正应一个学术会议之约，探讨“文学兴衰的规律何在”的问题。经反复思考和探究，我认定：文学的兴衰当然离不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

大环境的影响，但这毕竟都属外部原因，文学兴衰最权威的魔杖，操纵在作家自己手中。作家本身的精神、心态、意志、素养和生活基础，是文学兴旺之本。否则，怎么解释同样的物质经济基础之上会有兴衰完全不同的文学，而进步的开明的政治和反动的专制的政治下同样会出现或兴旺发达，或衰败疲软的文学的事实呢？在不乏坎坷和艰辛的环境中脱颖而出的李显福及其报告文学的成就，是否也为这一引人入胜的规律提供了又一例证呢？



作家小传

李显福 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四川日报社作记者，后调重庆市新闻出版局报刊管理处工作。

1972 年始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在报告文学创作上卓有成就，其《未婚同居者咏叹调》被评论家誉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四大咏叹调之一。

结集出版报告文学集《成功者的道路》、《未婚同居者纪实》、《系在山巅上的梦》和长篇报告文学《独木桥上的眼泪》，另有散文集《朝拜太阳的人》，已交出版社。

现系重庆作家协会、四川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重庆市新闻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重庆市文联委员。

目 录

新闻报业拓荒牛

——记《厂长经理日报》总编辑龙良贤…………… (1)

哨兵…………… (14)

追求者…………… (33)

麻将声声

——关于麻将风的报告…………… (54)

“黄灾”启示录…………… (107)

寻找川江号子的法国姑娘…………… (122)

啊,一年又一年……

——未婚同居者咏叹调…………… (138)

川妹子,你为何走上那条路?…………… (163)

保姆市场,一个解不开的怪圈…………… (177)

的士:万花筒…………… (242)

女子推销,一个神奇的世界…………… (288)

欢迎你,归来的亲人…………… (326)

流失生,平地而起的黑色狂潮…………… (343)

人啊,请手下留情

——为大地母亲代写的万言书…………… (398)

个体世界的困惑…………… (435)

重庆办报办刊热透视…………… (474)

新闻报业拓荒牛

——记《厂长经理日报》总编辑龙良贤

冯光国

当中国的历史翻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一股强劲的改革春风平地而起，吹走了禁锢中华大地几千年的陈腐之气。于是，终于有了对人的发现；于是，便有了创业新篇……

一位新闻战线上的探索者，准确地把握住了机缘契机，依靠自己的智慧、坚韧和勤劳，率先在中国报业界探索出一条成功的全新之路。

他，就是《厂长经理日报》的创办者、总编辑龙良贤。

漫漫征程，一部炫目耀眼的创业史

龙良贤，中等个头，身体纤弱，面庞瘦削，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覆盖着一对时常迸出智慧火花的眼睛。仅从外表看，谁也不会把他与“新闻改革开路先锋”、创办了一张又一张报纸的“报业新星”相联系。他就是这样，给人留下的是一种返朴归真、回归普通的形象。

1970 年，龙良贤参加工作到了煤炭部 56 处。这是一个从事矿山建设的野外施工单位，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矿建工人无悔无怨的苦干实干精神激发了龙良贤立志宣传他们业绩的热情，促使他第一次拿起笔向报刊电台投稿，由此走上了新闻工作生涯。

1974年，龙良贤到了56处机关宣传科任新闻干事，这给他提供了一展才华的广阔天地。于是，他的笔更勤了，一篇又一篇的通讯和报道见诸各级报端，使煤炭部56处这个全国一流施工单位的知名度很快在社会上扩大开来。龙良贤也由此跨入了自己的创业之路：1983年，他调入《中国市容报》，直接从事新闻编采工作；1985年，他到重庆团市委创办了《青年之声报》，完成了从写稿、编采到办报的第一次轮回。

当《青年之声报》受到山城青年交口赞誉时，龙良贤却功成身退，回归到企业行列，于1986年8月创办了全国第一张直接指导企业生产的报纸——《企业报》。为办好《企业报》，龙良贤亲自出马，参加采访、撰稿、组版、校对甚至拼铅板，累得几乎要垮架了。当第一张《企业报》呼啸而出时，他的疲惫、困苦也就随之消遁，一丝欣慰的笑意抹上了他那瘦削的脸庞……

在龙良贤不算太长的新闻生涯里，没有闲暇和逍遥，有的只是高度的紧张和忙碌。一方面，他要深入各地采访，笔不离手地写稿；一方面，他要忙于自己的报纸事业，为创办报纸而奔走操劳。就这样，一张又一张的报纸办了起来；就这样，一篇又一篇好稿从他的笔下流出来。他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办矿工报，为宣传“无名英雄”尽力效劳；办青年报，就写了许多情文并茂、耐人思索的好文章；在市容报，就从脏、乱、差中热情歌颂对美的追求；办企业管理报，就和企业家交上朋友，为改革开放的闯将们鼓与呼……1991年7月，中国卓越出版公司精选了龙良贤的新闻作品，汇编成34万多字的集子——《希望之光》，出版后引起了强烈反

响，很快销售一空。他的新闻作品，涉及范围非常广泛，有通讯、特写、访问记，有散文、杂文、评论、述评、调查报告等，不少的作品在全国获奖……不难看出，龙良贤是一位熟悉新闻十八般武艺的全能手，是富有开创精神的新型报人。

龙良贤有一颗对新闻工作炽热的事业心。为了新闻事业，他可以几个月不要工资，心甘情愿地倒贴腰包；为了新闻事业，他早上吃一碗面条可以管一天。长期这样废寝忘食地工作，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胃病时常复发，痛得他大汗淋漓，满床打滚……成绩的背后，隐藏着多少艰辛多少苦痛啊！

办报一次次成功，好作品广泛流传，使龙良贤在新闻界声誉鹊起。然而他没有醺醺然，他头脑里活跃的新闻细胞又在躁动不安。他在谋求一种新动向，一种新契机……

天之骄子，办成了别人不敢想象的事业

龙良贤看到大量的经济信息类报刊每天纷呈的信息令中国企业家们目不暇接！企业界迫切需要新闻界提供精心筛选的专业信息。这恰恰又是新闻界的一大死角。他捕捉到了这个炙手可热的契机，与从事新闻、出版管理工作多年的挚友陈晋，携手创办了中国第一张面向两千多万法人代表报纸——《厂长经理报》。

在中国，报刊历来都是由国家包办，依靠财政补贴来维持。享有优裕条件的情况下，不少报刊都举步维艰，甚至难以为继，独立办报就简直不敢想象了。试为者全国鲜有，成功者更是寥若晨星。

就是这样一件令人不敢想象的事业，龙良贤和他的伙伴们竟办成了。他们在没有经费、没有办公地点、没有任何设施的条件下，仅凭所筹措的 5000 元钱和一吨加拿大新闻纸这个令人见笑的“家当”，开创了自己的宏伟事业。在众多综合性党报、各类经济信息报和日趋活跃的晚报、文摘报的夹缝中崛起，建立了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新机制，走出了一条光辉灿烂的创业之路：

1987 年 3 月，重庆市委宣传部批准了《厂长经理报》的创刊；1989 年 5 月 12 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同意《厂长经理报》公开发行的批文；1990 年，建立了报社激光照排中心；1992 年 3 月，报社挥师西进，从重庆迁至成都，以求报业发展的更大空间；继而先后建立了“四川省现代企业发展公司”等多种经济实体；1992 年 5 月 26 日，新闻出版署批准报纸从 1993 年起更名为《厂长经理日报》；1993 年下半年起，日报将由四版增至八版；报社现在已拥有了自己的现代化办公大楼和先进的办公设备，还兼并了四川省科技文化印刷厂；员工由创办之始的四、五个人发展到 200 多人……报社正在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商社式报业实业集团化的道路上大步迈进。

不懈的追求赢来了空前的成功，得到了有关领导和企业家的肯定和赞扬。1988 年，田纪云副总理题词：“以改革的精神把厂长经理报办好”。中顾委委员、国家计委顾问、中国经济信息报刊协会会长冯纪新，中央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郝盛琦，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会长袁宝华，国务院经贸办公室副主任赵维臣，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罗元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王强华，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王福如，中共中央